**Robert Vannoy 博士，《申命记》讲座 8**© 2011，Robert Vannoy 博士、Perry Phillips 博士和 Ted Hildebrandt

**旧约**  
复习中圣约形式的现状  
 上周我们在你的大纲上讨论了罗马数字 III。那是第二页，“申命记中的圣约形式及其历史意义”。但为了让我们清醒一下，“A”是“这本书的结构完整性经常受到质疑”。读《申命记》的通常方法是找到它，它有一个原始的核心，但有很多补充的附加内容和双重引言。冯·拉德（Von Rad），“B”，在 1938 年呼吁人们注意《申命记》结构模式的重要性。1938 年，冯·罗德（Von Rod）看了这本书，说这件事有一个连贯的结构。请记住，我给了你一个概要。他曾经批判性地审视过这个形式，他认为整体确实表现出了结构上的统一。但后来“C”梅雷迪思·克莱恩利用了形式批判方法来尊重本书的完整性，这应该为《申命记》的结构打开一个新的视角，这反过来又对其解释和日期产生影响。  
 上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C”上。第 1 点到第 12 点是我试图总结克莱恩关于条约-盟约类比的论点，以及该类比对当前的影响。这把我们带到了第三页的顶部，即“D”，“旧约中的圣约形式及其历史意义：申命记辩论中的现状”。现在，这个“D”可能会占用我们今天的大部分时间。我希望我今天能完成这个工作，这样我们还有两周的时间继续讨论崇拜的集中化问题。但这就是我们从“D”开始的地方。在“D”下，我有 1.“圣约形式的性质及其起源：宗教或历史。”  
  
对 Exod 的一般评论。 19、乔什. 24和1萨姆。 12 在开始讨论 1 之前，让我对标题“旧约的圣约形式及其历史意义：申命记辩论的现状”做一些一般性评论。我认为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在旧约中可以找到一种可辨别的圣约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可以在申命记的结构中找到。它也可以在其他许多地方找到。大多数讨论过这一点的人都在出埃及记第 19 章至第 24 章中找到了它。那是最初建立圣约的西奈材料。大多数人在约书亚记第 24 章中找到了这一点。在约书亚记 24 章中，约书亚呼召所有以色列人到示剑，重申他们对耶和华的效忠。我认为约书亚记 24 章可以正确地称为圣约更新仪式。这是约书亚生命的尽头；他呼吁人们在主即将去世之际重新效忠他。

领导层的转变与《申命记》的结尾（摩西生命的最后时刻）非常相似。你可能会说，领导层的过渡试图在领导层过渡期间提供圣约的连续性。但你可以在约书亚记 24 章中找到与申命记中相同的条约形式要素。然后，如果你继续阅读《撒母耳记上》第 12 章，我的论文涉及《撒母耳记上》第 12 章，你会发现条约形式（盟约形式）的相同或至少一些相同要素。这一章是撒母耳一生的结尾，他为建立扫罗王国而向君主制过渡做准备。我自己的观点是，《撒母耳记上》11:14 至 12:25 是吉甲的圣约更新仪式，称为“圣约连续性”，伴随着从士师时代到君主制时代的转变，并为这一过渡做好了准备。  
  
盟约和历史：Baltzer 等人。

我的观点是，大家一致认为，你可以在《出埃及记》、《申命记》、《约书亚记》和《撒母耳记上》第 12 章中找到圣约的形式。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致的，但对此达成了相当好的共识。然而，对于这种形式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并没有相应的共识。这就是你们更多地陷入争论而不是讨论的地方。许多人会认识到这种形式的存在，但它的起源是什么？这种形式有什么历史意义？一些学者抵制从文学形式的存在中得出历史结论的尝试。他们只想看形式，却不想从中得出历史结论。在我的书第 144 页，注释 30 中，一位名叫巴尔泽 (Baltzer) 的人写了一本名为《*契约公式》(The Covenant Formulary)*的书，他在评论门德尔森的文章《古代近东以色列的法律和契约》时，谈到门德尔森时说道，“他更感兴趣的是历史问题，而目前的工作仅限于更批判性的方法。毫无疑问，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出历史领域的进一步结论，但我认为过早地将这两套问题放在一起在方法论上是危险的。”巴尔泽正在犹豫是否要就这种形式的存在得出历史结论。他说，过早地将这两套问题放在一起在方法论上是危险的。

然后有一位德国学者说：“通过什么历史途径来解释赫梯之约条约与旧约之约的制定的相似之处仍然很不清楚。”他说，赫梯条约形式和盟约之间的历史联系相当不清楚。然后另一位同事谈到巴尔泽时说，“巴尔泽自始至终都存在于他的形式批判性调查和情节叙述者的历史性之间的鲜明分离中。这种对历史问题的保留，与怀疑主义相去甚远，其活力归功于冯·拉德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巴尔泽成功地避免了草率和不成熟的结论。作者有权限制其材料的范围，但令人失望的是巴尔泽拒绝历史结论。”   
  
DJ 麦卡锡

然后 DJ 麦卡锡说道：“毫无疑问，从这个类比中得出了太多的结论，尤其是从中得出了不合法的历史结论。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否定类比的证据。”换句话说，保留类比，但要小心从类比中得出历史结论。嗯，我认为当你遇到关键问题时，谨慎是当然应该的。我认为这就是形式关键方法经常被滥用的地方。你得到了某种形式，并对产生这种形式的环境进行了非常推测性的重建，得出的历史结论可能非常值得怀疑。你看，形式批判方法论的全部内容是，如果你有某种文学形式，它就预设了产生这种形式的某种历史背景。这就是产生这种形式的  
技术术语*“Sitz im Leben” ，你想要回过头来理解是什么情况产生了这种形式。* 在我看来，明智地尝试描绘特定形式的历史背景可能是一种有用的解释工具，在我看来，我们这里有某种形式，并且明智地我们可以问产生它的背景是什么，这可以帮助理解相关表格的意义和解释。如果你要避免这种情况，那么你对形式的研究就会变得贫乏。我认为，当我们谈论圣约的形式及其历史意义时，我们当然需要谨慎；但我们不应该拒绝接受圣约形式的历史含义。   
  
1.圣约形式的性质及其起源：宗教或历史。  
 好的 1.“圣约形式的本质及其起源：宗教或历史。”现在，我把这个标题放在这样的位置，因为邪教和历史不一定是对立的。有些东西可以同时具有宗教性和历史性，但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种形式既具有宗教性又具有历史性。该盟约是在西奈半岛获得批准的情况下订立的。有献祭、洒血等等，所以你可以说这是邪教，但同时它也是历史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冯·拉德对此所做的事情。

记得上周，甚至在此之前，我们注意到冯·拉德早在 1938 年就谈到了《申命记》的结构。我想我上周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他概述这本书的方式和他所看到的结构。他提出该结构源自邪教，他认为该结构在以色列保存下来并在以色列传承，并从利未人的讲道中发现它在申命记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它具有邪教起源或改革。

现在已经是1938 年了。那是在任何人提请人们注意条约-盟约分析之前：很久之前。 Mendenhall 的文章是 1954 年的，所以时间晚了一些。随着最近条约材料的曝光，冯·拉德并没有改变他的立场，尽管他承认并接受条约与盟约的类比。如果你看一下他1957 年出版的*《旧约神学》* ，这是该书的第一卷，第 132 页，他说，“古代近东条约的比较，特别是赫梯人在 14 世纪和 13 世纪制定的条约公元前和旧约中的段落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形式问题，因此宗主国条约和某些段落中对耶和华与以色列所立之约的细节的阐述之间必定存在某种联系在旧约中。”然后他对我们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回顾：条约的结构以及它与圣经材料的比较。他说这在很多段落中都可以找到，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他继续说道，“即使答案的细节还存在很多疑问，但至少毫无疑问，这两种材料是相互关联的。条约和盟约都是材料，在这方面的关系形式可以追溯到后使徒时代的文本。当然，以色列接管了这里，但我们记得一些相关旧约材料的时代。当我们记得一些相关旧约材料的时代时，我们不得不认为，以色列很早就熟悉了这一条约模式，甚至可能早在士师时代就已经熟悉了。”现在很有趣的是：他说以色列在其历史的早期就必须熟悉这一基本结构。也许早在士师时代。但那是在 1957 年他的《*旧约神学》中*。

例如，冯·拉德在《约书亚记》第 24 章中发现了圣约条约时期的开始。他在 1957 年的*《神学》中提到了这一点*。1964 年，他发表了《申命记》的评论。他再次讨论了这一点，但现在与申命记有关。在第 21 至 23 页，他说：“最后我们必须提到《申命记》中使用的一种成分，学者们最近才认识到这种成分，即用于圣约的公式。对此的讨论才刚刚开始。它已经为一些人所熟知。”古代近东的统治者，尤其是赫梯人，过去常常按照一定的模式与他们的封臣签订条约。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条约模式可以在旧约圣经的不少部分中找到，以及《申命记》中的其他内容。”他再次讨论了该形式，我不再重复。但他说，“在《申命记》时代，这种模式长期以来一直被自由地用于文学和说教目的；即使是个别单位也非常零星地使用，毫无疑问，它们都是以已经提到的完整形式为蓝本的。”但他随后表示，问题仍然很悬而未决：以色列如何以及何时通过这些早期近东与附庸国签订的条约的形式理解其与上帝的关系。

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以色列如何以及何时通过这些早期近东附庸条约的形式理解其与上帝的关系。后来他说，如果我们问《申命记》的安排模式对*“生活中的生活”*有什么要求，那么它只能来自邪教庆典。看，有这些邪教起源的想法。 “它只能从宗教庆典中得到。也许是来自更新圣约的盛宴。这一猜想得到了插入正式圣约制定的支持，申命记 26:16 – 19。因此，正规圣约公式的经典模式无论如何都只以残缺不全的形式出现在申命记中。它的背景是申命记形式最初植根于的邪教，但在书中已经被抛弃，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这是因为它的内容现在以向俗人讲道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即使你在本书的结构中发现了条约与盟约的类比，《申命记》的基本形式仍然是对平信徒进行说教的形式。

他回到了他的“利未理论”，即利未人在讲道中保留了这种圣约形式，这是他们对崇拜中保存并代代相传的古代传统的回忆。因此，当他在第 26 页上得出《申命记》日期的结论时，他说：“我们假设北部圣所之一，示剑或伯特利，是申命记的起源地，而 621 年之前的世纪一定是它的日期。” 。没有充分的理由进一步追溯。”换句话说，这是公元前621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那是在700年代。那已经相当晚了，他觉得你在申命记中找到的形式是源自崇拜并由利未人的讲道保留下来的形式。所以你看，这确实是形式起源的一种邪教衍生，尽管他承认与赫梯条约材料有相似之处。  
  
范诺伊对邪教起源假说的分析 现在，在我看来，邪教起源假说确实没有对所讨论的形式的本质及其在旧约中的使用给出充分的解释。它确实没有回答最初使用该形式的场合和原因的更基本问题。那是什么时候？他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圣经将条约之约的最初运用描述为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提供的圣约材料。这就是它的由来。正如克莱恩所说，“上帝使用了赫梯条约形式的法律文书，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形式，作为向他的子民呈现这个圣约的一种手段，并按照该已知法律文书的方式构建它。”  
 JA 汤普森 (JA Thompson) 在《改革宗神学评论》( *Reformed Theological Review )*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邪教信条与西奈传统”（位于您的参考书目第五页）的文章中这样说道：“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世俗条约中的历史序言是任何条约的基本方面。我们也无需怀疑，它代表了先前历史事件的正确轮廓，尽管可能以某种增强的形式，这些历史事件被作为附庸国接受该条约的有力论据而宣扬。条约中的历史序言给了我们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大王和诸侯之间以前的关系，这为诸侯对大王的义务提供了基础。”好吧，他说，“冯·拉德在讨论《申命记》和《出埃及记》第 19-24 章时，当然会注意到西奈半岛事件的历史叙述。”《申命记》的第一部分充当历史序言，回顾并回顾了历史。西奈半岛。  
 但是，对于冯·拉德来说，这种历史叙述只是一个历史真实性非常可疑的邪教传说。但应该问的问题是，邪教传说是否能达到所要求的目的。看，历史序幕的运作方式是，如果这些事情要成为持续关系的基础，那么它们确实必须发生。汤普森说：“不应该认为邪教礼拜仪式应该与潜在的历史事件脱节。”我认为这就是重点。也许在邪教中形成了一种保存。这有点推测，但你看，它是从哪里开始的？它起源于哪里？事情的历史依据是什么？在我看来，冯·拉德的邪教派生观点的这一点是不够的。这种关系——盟约关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建立的。该形式预设了盟约最初正式成立时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因此，在1.“圣约形式的本质：它是邪教的还是历史的”下，在我看来，冯·拉德并没有公正地回答该形式的起源问题。我们回到西奈半岛寻找背景，或者对以色列宗教传统和信仰的这种形式的初步介绍。   
  
2.条约形式的演变及其对条约生效日期的影响  
 申命记  
 好吧，2。我们谈论的是申命记辩论的现状，2 是：“条约形式的演变及其对申命记日期的影响。”当我们上周讨论克莱恩的观点时，我希望你们清楚，他关于马赛克起源的论据很大一部分在于他的主张，即条约形式经历了进化发展，因为存在一种经典的赫梯模式，后来的条约中没有重复，特别是《以撒哈顿条约》和《塞菲尔条约》。现在，我想更仔细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受到质疑的观点，并且有很多内容值得探讨。   
  
A。以撒哈顿诸侯条约与赫梯宗主国条约的比较  
 那么，让我们看一下 a)“以撒哈顿诸侯条约与赫梯宗主国条约的比较。还有一个介绍性的评论： 1955 年，英国考古学家在现今伊拉克境内一个叫尼姆鲁德的地方发现了埃撒哈顿的附庸条约。这些石板是在纳布神庙的王座室中发现的，周围是公元前 612 年米底人纵火烧毁该建筑而产生的废墟。这些文本是由一位名叫芭芭拉·帕克的女士发现并确定为条约的。这是亚述王以撒哈顿于公元前672年签订的条约。条约不止一个，但内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条约缔结时个人人数不同，名字也变了：不是以撒哈顿的，而是下属的名字变了。这些文本是重复的，仅在签订条约的各个统治者的名字上有所不同。因此，这些条约实际上是与以撒哈顿和各个附庸国签订的条约文本。但 DJ Wiseman 在 1958 年将它们发表在名为*《伊拉克》*第 20 卷的期刊中。 *“伊拉克”*是该杂志的名称，《1958 年第 20 卷》。  
 如果您查看这些条约，您会发现某些内容与早期赫梯条约的内容非常相似。所以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如果您查看结构，您会立即看到这种差异。如果你看一下结构，你会发现它遵循这六个要素：首先是序言；第二，诸神作见证；第三，规定；第四，咒骂；第五，效忠宣誓；然后第六，另一段咒骂，以明喻的形式咒骂。  
 现在让我对每一个都发表一些评论。首先是序言：在赫梯条约中，它介绍了条约的缔约方，而在这些以撒哈顿条约中，它随后指出了该文件的目的。以撒哈顿说：“关于亚述王以撒哈顿的儿子王储亚述巴尼拔。”该条约的目的是确保当以撒哈顿去世时，这个特殊的儿子，即王储，将继承他的王位。因此，这与亚述王位的继承有关。当时的目的是关于亚述王以撒哈顿的儿子王太子亚述巴尼拔。这项条约对以撒哈顿在亚述帝国掌权的所有统治者都具有约束力。已发现许多不同个体的副本。好吧，这就是序言。  
 作为见证人的诸神是第二部分，其中列出了 缔结条约时在场的诸神的名单。仪式的文字表明，这些神的图像被带到仪式上，条约在他们面前正式颁布并生效。列举了十七位神灵。所以你就有了神的名单。  
 那么这里是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规定的关注范围相当狭隘：它们旨在确保亚述巴尼拔统治的持久性，因为他被指定为以撒哈顿的继承人；这是该条约所关心的问题。因此，这些规定试图解决的是所有可能对亚述巴尼拔继任者地位构成威胁的情况。您几乎必须阅读该条约才能了解条款的范围及其涵盖的意外情况。  
 诸侯宣誓遵守的条款有三十三条。它们可以分为五组。首先，确保封臣对作为以撒哈顿继承人的亚述巴尼拔的忠诚。其次，概述了针对叛乱分子采取的行动。第三，那些阻止企图篡夺王位的行为。第四，禁止与其他王室成员勾结以废黜亚述巴尼拔。例如，不要回应任何使以撒哈顿反对亚述巴尼拔王储的做法，也不要受到任何声称拥有个人权力向亚述巴尼拔报告任何分裂亚述巴尼拔及其兄弟的阴谋的人的影响。第五，强调宣誓的永久性和约束力。规定的重点很窄；这一切都与安全有关：继承权以及以撒哈顿死后亚述巴尼拔的持续权力。  
 在管理封臣与以 撒哈顿和亚述巴尼拔的关系的 355 行规定之后，您就可以通过对任何更改、忽视或违反石板誓言或将其删除的人宣布的诅咒来保护该文件。每个神都被单独命名，并且每个特定神的活动都会发出特定的诅咒特征。您将所有这些神祇都与诅咒一起列出，并且每一位神祇都被再次列出，并附有与每个神祇相关的特定诅咒。例如，“愿天地之光不会公正地审判你，‘愿你的眼睛变得黑暗’。”在黑暗中行走。”沙玛什是太阳神，所以你的诅咒与所涉及的神的特殊特征有关。因此，许多神的愤怒都会向违反规定的人祈求。然后第五，宣誓效忠。这一部分的封臣宣誓效忠以撒哈顿和亚述巴尼拔，这里的语言切换为第一人称复数，这表明该文件将在公共仪式上使用，人们在仪式上说：“我们会这么做。”  
 第六，宣誓效忠后有明喻形式的咒骂。你又回到咒骂上了。其中大多数都是以使用常见观察中的明喻的风格来表述的。例如：“正如雄性和雌性的孩子、雄性和雌性的羔羊被切开，他们的内脏滚到他们的脚上一样，愿你的儿子和女儿的内脏滚到你的脚上。”这是一个很长的部分，其中有一种称为“诅咒明喻”的明喻。 DJ Wisemen 表示，其中一些（如果不是全部）可能已经展示在人们面前，以生动地说明违反条约的后果。换句话说，也许是男孩和女孩的内脏碎片从他们的脚上滚下来。他们可能将其中一些动物切开，以展示和展示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您几乎必须阅读本文才能了解情况。例如，“正如雨不会从黄铜的天堂落下一样，雨和露水也不会落在你的田野和草地上。愿你的土地上降下燃烧的煤炭而不是露水。正如饥饿的母羊将幼崽的肉放入口中一样，你也可以用你的兄弟、儿子、女儿的肉来充饥。正如蛇和猫鼬不会进入并躺在同一个洞里，只想着砍掉彼此的腿一样，愿你和你的女人进入同一个房间而不考虑砍掉彼此的生命。”在该部分之后，条约以日期和条约关注点的简短声明而突然结束，即亚述巴尼拔被任命为王储和以撒哈顿的继承人。这是对该表格的简要调查。   
  
3. 历史序言的缺失 纲要 的第三点开始描绘亚述条约和赫梯条约之间的一些对比和差异。第三个是：“历史序言的缺失”。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赫梯条约的形式相当一致，几乎没有偏差。赫梯条约与亚述条约最显着的对比是，赫梯条约格式的第二部分在亚述条约格式中没有找到。请记住，赫梯条约是这样的：序言、历史序言、规定——基本上详细描述了诅咒、见证和祝福。亚述条约没有历史序言。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赫梯条约的历史序言奠定了条约的基调。正是基于历史序言中所记载的大王的仁义行为，诸侯才通过条约的规定产生了服从的责任感和义务。这样你就得到了历史序言，后面是规定。历史的序言提供了诸侯对仁慈的伟大国王的义务感。  
 因此，正是基于这些仁慈的行为，伟大的国王才证明了遵守规定的合理性。目前赫梯条约的残破文本都有一个历史序言，或者至少有一个历史序言。现在我这么说，尽管这是一个争论点。  
 门登霍尔之前对赫梯条约的初步研究引起人们对旧约圣约材料与赫梯条约之间的类比的关注。这些条约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就已出版并被研究过，但从未与旧约中的圣约联系起来。此前有一位匈牙利研究员维克多·科罗塞克 (Victor Korosec) 于 1931 年在德国出版了一本书，讨论赫梯条约文本。本书对赫梯条约文本进行了标准处理，但没有与圣经进行比较。科罗塞克在 1931 年的历史序言中说道，“这种表述的不断出现表明，在哈图萨”（赫梯帝国的首都）“人们将其视为每一项附庸条约的基本要素”。在他对文本的研究中，这就是他的结论。  
 最近，在 DJ McCarthy 的整个作品中，他们出版了这本书，《*契约的处理*》，我相信这在你的参考书目中，它现在已经在比这本更晚的版本中出版了。在第 5 页的顶部， *《盟约的处理》* ，1978 年，麦卡锡对每个赫梯条约都有历史序言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说其中一些没有历史序言，因此他说历史序言不是条约形式的基本要素。   
  
H. 霍夫曼对麦卡锡的回应 现在您已经参与了有关该问题的大量详细讨论，但让我提请您注意麦卡锡，他说这不是表格中的基本要素。赫伯特·霍夫曼在这一点上不同意麦卡锡的观点。不幸的是，我在你的参考书目中没有它，但赫伯特霍夫曼在天主教*圣经季刊，*第 27 卷，1965 年第 109-110 页上写了一篇名为“出埃及记，西奈山和信条”的文章。他就这个问题与麦卡锡进行了互动。他支持科罗塞克。霍夫曼说，“第一个千年条约”（即《埃撒哈顿条约》）中历史序言的省略，以及更详尽、更丰富多彩的诅咒的倾向，“代表了条约关系概念的根本变化。权力取代了说服力，尽管条约形式在许多方面仍然相同，但声称条约基本保持不变是一种误导，这与 DJ 怀斯曼和麦卡锡相反，他们最小化了条约的差异。”  
 现在，我不会花时间详细讨论这一点，但我只想提一下麦卡锡所说的五项条约，即早期条约，没有历史序言。因此他说历史并不是条约形式的基本要素。现在霍夫曼指出，如果你看一下麦卡锡所说的缺少历史序言的五项条约，霍夫曼分析了所有五项条约并得出结论，麦卡锡确实没有根据他在研究这些条约时得出的结论。  
 比如第一个，穆尔西利斯二世和阿穆拉的尼米特帕之间的条约，霍夫曼说它确实有序言，但很短。它说：“至于你尼米帕，我让你回到你的国家，并让你坐在你父亲的王位上。”这是历史的序幕。虽然是一句话，但你可以看到霍夫曼说的是什么，历史的序幕在那里，尽管麦卡锡说不是。我认为霍夫曼是对的。  
 第二个条约是穆尔西利斯二世与基塞伊利斯之间的条约，它是一个不完整的条约；它在预期的地方没有序言，但霍夫曼说这不是决定性的。他说，尽管麦卡锡声称历史序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在除了标题和规定之间之外的任何地方，但他忽略了苏皮卢乌马一世和阿齐拉斯之间条约的赫梯版本，其中的顺序是序言、规定、序言。现在他发现这篇文章中有一个序言，但顺序不同；它不遵循标准顺序。  
 第三个，苏皮卢利乌马和胡卡纳斯之间的条约确实有序言，但也很简短。 “看，你，胡卡纳斯，我接待你是一个简单但有能力的人，我尊敬你，在人民中间接待你和哈图萨斯，并以友好的方式介绍你。我把我妹妹许配给你了。”这起到了历史序幕的作用。  
 所以我不会讲四点和五点，但是对于所有这些，你会陷入一场相当技术性的辩论。该条约有序言吗？麦卡锡说不，但霍夫曼随后表明他们确实这样做。有一个合理的回应。因此，历史序言的缺失是对赫梯形式的一种偏离，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偏离，因为序言为条约定下了基调。当你读到亚述条约时，条约伙伴之间没有一种充满爱意和信任的关系，没有历史序幕。大王的仁义行为，没有先列的；相反，你将原始权力强加给封臣。封臣必须做所有这些事情，否则你会得到双重诅咒列表，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会受到困扰。

因此，缺乏历史序言不仅是文学形式上的差异，而且在条约伙伴之间的关系上也设定了截然不同的精神。所以宗主和他的封臣之间建立的关系的质量是有很大不同的。

我们需要休息 10 分钟，然后再回来再看一下。

转录：布列塔尼·戈登、伊森·基尔戈、珍妮·马查多、玛吉·布鲁克斯、  
 梅根·艾弗里，威廉·哈根编辑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